

学习有理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体用之道”

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

作为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习近平文化思想自有其独特的理论品格和体系结构。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用“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来概括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特质,既体现了党中央越来越有意尝试运用中国本土概念进行党的话语体系创新,也彰显了该思想的深邃意蕴和有机构成。值得注意的是,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文化建设方面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依循古意,所谓“篇”,既指首尾完整、意蕴深邃的力作,《论衡》有云:“出口为言,著文为作。”正是此意;又指体系性著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恰如《说文》所言:“谓书于简册可编者也。”这提示我们,深入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体用之道”,一大关键即厘清其内在的重要构成内容。

既然“习近平文化思想既有文化理论观点上的创新和突破,又有文化工作布局上的部署要求”,那么审视其“体用之道”的基本角度当是从理论层面与政策层面双向入手。此次会议就“体用”这一古典术语的借用,很大程度上是取其神似抑或精髓,即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文化建设方面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是一个有机的理论系统,进而而言是体用不二、高度融汇的。因此,围绕党的十八大以来文化建设领域众多新的理论创见、工作部署,为了更凝练地深刻领会,势必需要“再结构化”的处理。习近平总书记^①在2018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曾强调“必须坚持以立为本、立破并举”,这恰是其明体达用的实践逻辑。回顾新时代的伟大文化实践,择取所立之大者,可见巩固文化主体性是基础,坚持文化领导权乃根本,担负新的文化使命为目标,三者相互衔接,构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体用之道”的核心内容。

以文化主体性为基石

深化“两个结合”,巩固文化主体性。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也揭示出党推动理论创新和实践繁荣的必由之路。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提出,极其充分且令人信服地说明: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两个结合”的重大成果。从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彼此互动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然要求进一步与中华文明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深入地结合。如果说“第一个结合”中的中华文明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是自在契合的对象,那么“第二个结合”中的二者已经是自觉契合的内容。“第二个

结合”让马克思主义在具有中国形式、中国形态之后,还具有了中国文化生命,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回溯新时代的理论探索历程,从习近平总书记^②在2013年曲阜考察发出“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号召,到2021年武夷山考察提出“有机结合”的命题,再由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所凝练的“贯通、融通”主旨到2023年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所揭示出的“五理核心要义”,党中央涵育“第二个结合”的过程历历可见,脉络至为清晰。一言以蔽之,“两个结合”是当今进行理论创新、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最为关键的方法论,属于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理论工具。

肇因于“两个结合”的持续深化,方可巩固文化主体性。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我的主体性。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文化,新时代我们在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基础上增加了文化自信。主体性是某个主体相对于客体才会内生的一种意识。文化的主体是人,中华民族自然是中华文化的主体,中华文化主体性是中华民族主体性的文化表征,是中华文化在同外来文化交往交流中得以界定自身、规定对话路径的文化立场与态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当代中国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作为“两个结合”光辉典范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为有力地体现了这一文化主体性。取是之有,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了文化自信这样的原创性理论。文化自信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是其鲜明体现。文化自信充分证明,文化主体性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来的;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建立起来的。与此同时,我们党始终秉承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凸显人民的文化主体地位,展现党领导和推动文化建设的鲜明立场。我们党须臾不忘保护历史文化遗产,这是推动文化传承发展、深化“两个结合”、确保文化主体性的重要载体,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蕴含着不言而喻的历史文脉。

以文化领导权为根本

着力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必须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意识形态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国家政治安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

的工作。面对改革发展稳定复杂局面和社会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媒体格局深刻变化,在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一刻也不能放松和削弱意识形态工作,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这是在深刻把握党领导意识形态工作中长期积累的宝贵经验,特别是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创造的新鲜经验基础上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一项关键目标。尤其是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我们确立了“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这集中体现了党在意识形态领域治理方面一种治道与治术的贯通。诸多论述和部署深刻阐明了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明确了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必须坚持的政治保证。

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科学把握,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于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的重视与深化。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是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是深刻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洞察时代发展大势后的必然之举,充分体现了新时代对文化地位作用的深刻认识。围绕这一重大战略,并聚焦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这个首要政治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始终强调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是坚持党的领导的重要方面,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鲜明提出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始终如一地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一项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坚持以德树人、以文化人,绵绵发力,使得这项任务顺利进入广泛践行阶段;掌握信息条件下舆论主导权,广泛凝聚社会共识是巩固壮大主流思想文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的题中应有之意,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事关党的长期执政,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福祉,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要把网信工作摆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中来谋划,切实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毫无疑问反映出党对信息化时代新闻传播规律的深刻总结。

以新的文化使命为目标

担负新的文化使命,建设中华民族

学习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

现代文明。在此次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期新的文化使命。新的文化使命彰显了我们党促进中华文化繁荣、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担当。这需要我们继续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

作为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之一,新的文化使命之落脚点和着力点即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是紧扣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同时将文化强国纳入其进程之中的长远目标。更为关键的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一定属于“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未来成果。换言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一定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彼此契合、相互成就的产物;一定是经由第二个结合,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的产物;一定是通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持续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而愈加巩固文化主体性的产物;一定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是文明自我更新、生生不已的产物;一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的文明新形态,是破除西方现代理论迷思、在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出来且融汇人类一切文明成果的产物。作为未来的长期目标,应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纳入文化建设层面更为高远的目标,由此可见党中央立足长远,谋划深透。这提示我们在建设自身的同时,尚需时刻注重对外的战略部署。一方面,要将增强我国国际话语权的重要任务摆在突出位置,不断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另一方面,始终不渝秉持开放包容,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应对全球共同挑战,开展更高层次和更深程度的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繁荣世界文明百花园。

“体者所以用,用者即用其体。”以文化主体性为基石,以文化领导权为根本,以新的文化使命为目标,在螺旋上升式的强“体”运“用”中实现“明体达用”,于迈进伟大复兴中愈加“体用贯通”,这或许是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体用之道”的一种视野。

【执笔者:王学斌,特约研究员,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教授】

社科论衡

浙江要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上积极探索。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浙江应继续充分发挥科学的文化建设战略指引、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支撑、丰富的红色文化精神引领、强大的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和广泛的对外文化交流等五大优势,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上发挥更大作用。

一是科学的文化建设战略指引优势。以战略思维顶层设计、系统谋划文化发展之路是浙江文化建设的经验总结和显著优势。早在2003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就把“加快建设文化大省”作为“八八战略”的重要内容,将文化建设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总体布局中予以通盘谋划和部署。2011年,省委十二届十次全会对加快推动文化大省向文化强省迈进作出了谋划和布局。2017年,省第十四次党代会会将“在提升文化软实力上更进一步、更快一步,努力建设文化浙江”作为“以‘两个高水平’的优异成绩,谱写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在浙江的崭新篇章”的六个具体目标之一。2022年,省第十五次党代会提出“高水平推进文化强省建设,打造新时代文化高地”的目标。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文化强省到高水平推进文化强省建设,历届省委始终坚持以战略思维谋划文化建设,坚持“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把“干在实处、走在前列”的要求贯彻到底,始终确保文化建设“勇立潮头”。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保持高度的战略定力和科学的战略思维,浙江以战略思维部署文化建设的成功实践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提供了有益经验。

二是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支撑优势。浙江有着悠久的历史文 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从一万年上山文化的孕育初发,到5000年前良渚文化的文明曙光,从2500年前越国精神的创立彰显,到1000年前宋韵文化的鼎盛辉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独特的文化基因,为文化浙江建设奠定了历史人文优势。上山文化、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越文化、南宋文化、青瓷文化等已成为具有较高知名度、鲜明辨识度的浙江文化标识。吕祖谦的“金华学派”、叶适的“永嘉学派”、陈亮的“永康学派”、王阳明的“心学”、黄宗羲的“工商皆本”主张等,不仅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丰碑,更内化成历代浙江人的行动准则和方向,构成了代代相传的文化基因。悠久深厚、意韵丰富的浙江文化传统,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宝贵财富,也是我们开拓未来的丰富资源和不竭动力。我们要继续深入总结、提炼浙江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人文精神和道德精髓,在赓续浙江历史文脉中积极探索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三是丰富的红色文化精神引领优势。浙江具有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是中国革命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在革命年代,这里诞生了中国共产党,诞生了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第一个中央机关;培养了陈望道、俞秀松、沈雁冰等一大批革命先辈;孕育了红船精神、浙西南革命精神、一江山精神等。在建设年代,浙江人民始终坚守红色根脉、弘扬红色革命精神,培育形成了大陈岛垦荒精神、妈祖岛精神、海霞精神等。在改革开放的生动实践中,又提炼概括了具有浙江地域文化特色和个性品质的浙江精神。我们必须全面激活浙江精神宝库中敢想敢试、敢闯敢拼、奋勇争先的“文化基因”,将全体浙江人的无穷智慧和伟大创造转化为勇做先行者的实际成效,积极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

四是强大的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优势。自古以来,创新创造就是浙江文化精神的基因。如王羲之对书法的继承创新、谢灵运开创了中国山水诗派等。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人率先从小“商小贩小市集”做起,走遍全国、全世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浙江主动塑造变革性实践、突破性进展、标志性成果,文化发展呈现出新气象。在文艺创作方面,浙江以文化研究工程为引领,文化成果实现了从“高原”向“高峰”的跨越发展,网络文学、动漫制作、文化创意等新兴文化业态层出不穷。在文化产业发展方面,浙江以全面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为动力,影视文化产业居全国第一方阵。在文化品牌打造方面,浙江打造了一批文化新名片、新品牌,如杭州国家版本馆、南宋德寿宫遗址博物馆等。中华文明在继承中不断发展,在创新中不断升华。浙江强大的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将成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动力源泉,不断开辟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新境界。

五是广泛的对外文化传播交流优势。浙江拥有广泛的对外文化交流渠道,是国际人文科教交流的枢纽。在平台通道方面,浙江在各领域积极开展丰富多样的国际合作,不断扩大“朋友圈”,通过各类国际性论坛、峰会、赛事、会展等,创造浙江文化“海外出国”的契机。在文化产品国际化传播方面,浙江是国产影视文化出海“领头人”。在侨胞交流方面,遍布全球的浙江侨胞是浙江与世界对话沟通的重要人际通道、中外民心沟通最好的“民间大使”。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在交流互动中发展。浙江应加强对中外文化交流和多层次文明对话,增进与世界文明深度融合,在共同推进人类社会发 展进步中积极探索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之路。

【作者单位:浙江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观点万花筒

四方面促进民营经济做大做强

在中国民营经济50人谈暨世界浙商发展论坛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彭森指出,《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重申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是对质疑民营经济、打击民营经济信心的响亮回答。《意见》第26条专门强调,“坚决抵制、及时批驳澄清质疑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否定和弱化民营经济的错误言论与做法”,这是中央旗帜鲜明的表态,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当然,有关的热论和质疑还不会就此消失,需要我们继续从理论上、政策上、法律上和实践中不懈努力。”彭森说。

一是理论上坚持解放思想,坚持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彻底为民营经济正名。民营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伴相生,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必须对其性质、定位、历史作用和运行规律在理论上进行总结和回答,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课题和历史任务。

二是政策上坚持竞争中性原则,彻底消除隐性壁垒。竞争政策是市场经济的基础性政策。《意见》专门强调“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健全公平竞争制度框架和政策实施机制,坚持对

各类所有制企业一视同仁、平等对待”。提振民营企业信心需要通过深化改革,提供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消除各种隐性壁垒,这就应该落实竞争中性原则。“竞争中性原则”这个概念在201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是指在要素获取、准入许可、经营运行、政府采购和招投标等方面,对各类所有制企业平等对待。

三是法律上坚持依法治国,用法律体系和制度安排为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保驾护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民营经济在一个地区是否有一个良好、公平、稳定、安全的营商环境,也是衡量这个地区法治建设成果的重要标志。因此,建议加快对涉民营经济法律法规的立改废释工作。

四是实践中坚持顶层设计、统筹协调、综合施策,有力促进的方针,扎扎实实把各项政策任务落实落细。

《意见》最大的亮点是明确提出“促进民营经济做大做强”。我们要通过这些工作,为民营经济营造更有利的发展环境,推动民营经济

“五系列由“中国民营经济50人谈”共同策划】

杨廷圣

俞耀铨



扫一扫 看视频